



山西大学建校110周年学术文库

“中国制造”镜像：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考察

ZHONGGUO ZHIZAO JINGXIANG JIYU FENGXIAN SHEHUI SHIJIAO DE KAOCHA

李彩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中国制造”镜像：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考察

ZHONGGUO ZHIZAO JINGXIANG JIYU FENGXIAN SHEHUI SHIJIAO DE KAOCHA

李彩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制造”镜像: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考察/李彩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0795 - 9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制造工业—研究—中国
IV. ①F42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2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2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4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含义	(1)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险现状	(9)
第三节 媒体与风险社会	(19)
第二章 国外媒体的“中国制造”风险图景	(33)
第一节 研究方法概述	(33)
第二节 《纽约时报》之内容分析	(37)
第三节 《时代周刊》之内容分析	(47)
第四节 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制造”图景	(54)
第五节 风险视阈里的“中国制造”图景	(81)
第三章 健康安全与国家利益——美国媒体建构风险的框架	(85)
第一节 框架理论梳理	(86)
第二节 健康安全框架下的风险建构 ——二甘醇牙膏事件报道	(92)
第三节 国家利益框架下的风险建构——贸易制裁报道	(109)
第四节 美国媒体建构“中国制造”风险的路径	(123)
第四章 国内媒体的“中国制造”风险图景	(127)
第一节 《人民日报》之内容分析	(128)

第二节	《人民日报》“中国制造”的图景	(132)
第三节	“中国制造”的风险图景：身份认同风险	(141)
第五章	国家安全框架——国内媒体建构风险的框架	(157)
第一节	再论二甘醇牙膏事件	(157)
第二节	国家安全框架下的风险建构	(167)
第六章	“中国制造”风险的应对	(176)
第一节	风险与媒介化风险的再认识	(177)
第二节	风险应对思路之一：慎用“中国制造”的概念	(185)
第三节	风险应对思路之二：重塑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193)
第四节	风险应对思路之三：打造负责任的媒体	(205)
结 语		(219)
参考文献		(226)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含义

一 风险含义的变迁

什么是“风险”？“风险”一词在英文里是“Risk”，本意是指冒险和危险，即风险是具有一定可能性的一定的危险，或者说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灾难。但对于这一词的来源却充满争议。学者们有的将它追溯到阿拉伯语，有的将它与希腊语和意大利语联系起来。不过，现在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法国的语源学词典的解释。据艾瓦尔德考证，风险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risque”，出现于早期的海上贸易和保险业中，指深海上运行的货船所具有的危险性。^①在老的用法中，风险可以理解为客观的危险，如像风暴这样的灾害或自然现象造成的危险。到17世纪时，这一词语才与现代英语中的含义相似，由最初的“遇到危险”转化为“毁灭或丧失的危险和可能性”。18世纪后，风险这个概念与人类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联系更加紧密，并被视为对待影响个人和群体的事件的特定方式。

1895年，约翰·汉尼斯在权威杂志《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作为

^①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经济因素的风险》一文,他将风险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认为风险是损失的概率,风险在分配理论争论中被当作获取利润的本质原因。20世纪50年代之后,风险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它们围绕着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種风险及其規制方式展开,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研究主题从核能、金融保险、环境、健康,一直延伸到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恐怖主义等更为宽泛的新领域。这一时期,关于风险的定义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取向的,将风险看成一种概率,采用期望频数进行统计;另一类是“经济—社会—文化”取向的,将风险看成一种社会后果。这两类定义的共同点是将风险看作是客观的不确定,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是可以预测、且均可以金钱观点进行观察与计价。风险真实性的认定,则以数学值的高低为认定基础。但是,客观本身就是有争议的概念,无法避免主观判断成分。而价值观与偏好根本无法从风险评估中免除。此外,危险与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与人为因素的互动是极为复杂的,同时它也不可能剔除环境与组织因素完全用任何概率方式予以解释。因此,这种客观实体派的风险理论不断受到人文学者的批评。

20世纪80年代,对风险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向:风险研究的社会学理论转向。这种转向跟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转向密切相关。此时,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发生了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把社会科学置于认识论的中心,转向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和历史^①。与此相应,社会学者将风险与社会、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并认为,风险不是独立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之外的客观实在,而同样是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结果。

二 风险社会概念及其本质

1986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赋予“风险”一词新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贝克

^① 张虎彪:“风险的社会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研究”,《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第88—90页。

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

他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① 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八点总结^②：

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

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

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

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

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

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

⑧一个人造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由此可见，贝克所说的风险，指的是完全逃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常常引致系统的、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

贝克将“风险”从一种局部领域的现象，上升为一个用来刻画整个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核心术语，在社会学中获得了同“后现代”、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8—189 页。

“全球化”、“共同体”、“平等”之类概念一样的关键观念地位。^①同年4月26日适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酿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随后，他在《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1988）、《世界风险社会》（1999）、《风险社会理论修正》（2000）、《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世界主义的欧洲》（2004）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

在贝克看来，全球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或者说，从传统（工业）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的破坏。这种风险是现代化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是“自反性现代化”社会的形态，是“制度化”风险，其主要制造者是政府、工业和科学。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反复强调反思性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三个概念，认为它们是风险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关联的方式。反思性现代化，指后现代人们对引发恐惧焦虑的社会条件的检讨与反省。风险社会就是对社会本身的反思与检讨。贝克认为过去社会中的威胁或危险是有地区性的，因而容易预防或回避。但如今风险呈现全球化趋势，风险的来源复杂，风险的后果很难计算清楚，甚至无法消除或回避。全球化的焦虑不安成为风险社会的特征之一。换句话说，风险不仅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也是处理威胁与危害的方式。因此，当代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三个特征：首先，风险造成的灾难是全球的、无法挽救的、不受限制的损害，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补偿无法实现；其次，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再次，其发生的时空界限无法确定。一系列全球性事件引起了人们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关注：先是疯牛病，接着是非典、禽流感。因而“9·11”事件之后，“风险社会”理论成为西方最

^① 成伯清：“‘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29—135页。

热门的理论之一,“社会风险”问题也引发了各国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探讨,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连锁反应事件及2011年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等也都证明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除了乌尔里希·贝克外,还包括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等。吉登斯主要从现代性制度的角度考察风险社会,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军事极权主义”都可能带来严重的风险。沃特·阿赫特贝格探讨了风险社会与民主的问题,指出自由民主政治不一定适合风险社会,协商民主政治才是风险社会的适宜模式。^① 弗兰克·费希尔则从风险意识与责任入手,批判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概念。莱恩·威尔金森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与忧虑问题。马克·丹尼尔则从全球战略角度构想了规避风险的新机制。^②

由此可见,风险社会理论专注于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变迁,以“风险”来揭示当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将“风险”置于社会结构形态中对当前的社会进行反思,宣告“风险社会”时代的来临,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一种新的社会定序原理。风险社会理论强调制度的重要位置:制度的功能既是专家系统又是民主论坛,既导致了許多自然的和认同的危害的产生,同时也在治理这些危害。他们把风险置于一个由制度构建起来的风险社会中。这样,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理解为一个由科学知识产生的、作为制度、作为理性和技术实践的社会建构。这被我国学者称之为“主观建构派”^③。因而,风险社会理论又可以看作是一种风险建构理论(The Theory of Risk Construction)。

① [荷] 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周战超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46—52页。

② 转引自马凌《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 <http://www.cjr.com.cn>。

③ 宋明哲编著:《现代风险管理》,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三 风险的建构性

除以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外,风险建构理论之中影响深远的,当推英国玛丽·道格拉斯主张的风险文化理论(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及与法国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一脉相承的风险治理理论(The Theory of Risk and Governmentality)。

1. 风险文化理论(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

风险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除玛丽·道格拉斯外,还包括海伦娜·约菲、斯科特·拉什等学者。其研究议题主要有二:一是为什么某些威胁或危险被社会视为风险而其他则不是?二是当风险被视为逾越文化规范的符号时,它是如何运作的?

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概念本身就是假设性和比喻性的,是人们用以对风险做出判断的心理模式,它并不纯粹只是认知的,而是涉及共享的惯例、期望和文化范畴。在她看来,“风险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有很强的人为色彩的创造物”。^①基于此,这一理论认为:风险是从社会角度建构的理解和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危险的反应,某些危险是由于违反社会的某些文化规范而被视为是风险,它实质上是通过文化的过程予以调节的风险认知,是一种文化符号。当一个群体用群生概念设定自己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衡量尺度后,违反群体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衡量尺度的,即被群体解读为风险。因此,道格拉斯不认为对风险的认识存在理性与不理性的问题,她认为那是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问题。同一危险在别的社会里不一定就被视为风险。在这里,对风险的感知被突出出来,由此可得出进一步的推论,那就是风险感知和“现实的风险”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道格拉斯将风险划分为三类: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技术带来的风险)。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归结为三

^① Douglas, M, *Risk and Blame: Essays in Cultural Theory*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46.

种风险文化所造成的结果：等级主义文化（视社会政治风险为最大化）；市场个人主义文化（视经济风险为最大化）；社会群落边缘文化（视自然风险为最大化）。第三类边缘文化中的社会群落则对主流和中心构成了威胁。在他们看来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并且在解释出错的事情或可预料的不幸时充当“辩论资源”。因此，风险是相对的文化概念，不同的文化团体之间对于什么是风险及风险是否被接受是有差异的。

斯科特·拉什从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入手，将分析点建立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与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之间^①。他认为，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他区别了社会风险与风险文化的不同，认为：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并且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和水平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件为基础的。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范和规则，而是依靠其实质上的价值。^②他认为，反思性判断是风险文化的核心。这种判断是基于感觉的评价——不是通过理解，而是通过想象或更直接的通过感觉发生的。而贝克的风险和反思性概念里的认知和非文化倾向是决定性判断，即客观的判断，具有客观有效性。因此，与贝克以制度来解决工业化技术所导致的风险的路径不同，拉什强调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要动员起过去被认为是个人的、私密的和主观的资源，社会相互作用和组织的运作将不再是基于对其他人未预料后果的反应，而主要是承担自身造成的

①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文化》，见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8—91页。

②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2—63页。

风险的责任。

2. 风险“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理论

风险“治理性”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艾瓦尔德等人。其主要议题是:与人们所谓的“风险”相关的专业训练、规章制度和机构,在建构主观与社会生活时是如何运作的?

这一理论特别强调风险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可以使任何事物现象均被视为风险,也可使人们说根本没有风险这回事。因而,这种理论的风险建构度最强。艾瓦尔德认为,“任何事情本身都不是风险,世界上也无风险。但是在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能成为风险,这有赖于人们如何分析危险,考虑事件”^①。可见,这一理论认为,风险不是事实的东西,是一种人类理解和规范现实的思想。用于发现风险的技术和政治理性与用于规制、管理风险的程序关系密切。他们借助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指出:16世纪以来,一个巨大的专家知识网络已经形成,与之相伴的是围绕这些知识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实践而出现的各种机器和制度。这是现代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出现的结果,它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诫”而非暴力或强制。因此,风险被理解为政府使用其训诫权力的一种战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以最好地实现民主人道主义。随着社会的“规则化”,那些严重脱离规则的人就被视为“带有风险”。

在勒普顿看来,以上三种风险建构理论在“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这一光谱上排列的顺序依次是“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和治理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度最低,治理性理论的建构度最高。它们依据其建构的程度,提出了解决风险的不同路径。贝克等为代表的风险社会学派以社会制度为轴心,主张打破以国家为主体的民主代议制,提倡实行“世界主义”的民主协商制度;而风险治理性理论更强调政府话语或战略在“风险”中的地位和作用;风险文化理论则反对以技术来解决社会风险,希冀以主观性判断的价值标准为基础,“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运作方式,特别是通过具有象征性的理念和信念来处理好涉

^① F. Ewald .1991, “Insurance and Risk” . In Burchell, G., Gordon, C. and Miller, P.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Hemdl Hem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及风险社会文化的各种问题”^①。

综上所述，风险建构理论的主要宗旨在于，“风险不仅仅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②，其主要议题有五个：第一，为什么某些威胁或危险被社会视为风险而其他则不是？第二，风险被视为反行为规范的一种符号或文化规范，它是如何运作的？第三，与“风险”相关的专业训练、规章制度与机构，在建构主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第四，风险与社会现代化过程有所关联，它们的关联方式是什么？第五，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风险如何解读？这也正是本文解读“中国制造”的出发点。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险现状

对一个国家而言，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它弥漫于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与时期，人们无法回避它；国家风险是变异的，不存在一视同仁的秉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内涵，对国家风险的分析是不断持续的过程；国家风险是可测度、可控制的^③。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社会风险的表现形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所区别。以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现实为基础的，虽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尚未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但是，其理论所内含的风险意识、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风险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积极探索，对思考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可以使我们充分认清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现存的社会风险，更有利于我们认识风险、理解风险、规避风险和超越风险。

①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63页。

② [英] 芭芭拉·亚当、约斯特·房龙：《重新定位风险：对社会理论的挑战》，见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王巍：《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一 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风险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① 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②。

本文把现代化理解为转型,将中国的社会转型看作是现代化过程和体制转型的过程(见图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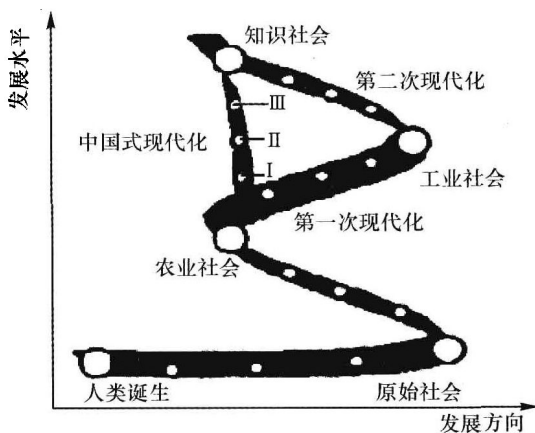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现代化进程示意图^③

①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5 期。

② 何鹏举，冒云辉：《社会学简明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1 页。

③ 引自林丹：“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巨大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在这个快速的社会变迁时期，中国社会不仅要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还要解决伴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如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所说，风险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在当前的中国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而基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风险也已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首先是经济风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虽然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加大了经济风险产生的可能。突发性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所有国家都会被卷入其中，无一幸免。其次是社会失序的风险。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断裂，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失业现象大量增加，两极分化严重，生成了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等新的不同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的解体，而旧秩序的解体又进一步带来了更为基础的机制的瓦解，即对信任结构的破坏。这种信任结构的破坏既包括个人层面信任的缺失，还包括系统层面上信任的缺失，后者表现为对政府和传媒的不信任。信任结构遭受破坏的社会必然导致一个失序的社会的出现。^① 第三是现代化进程中所引起的政治风险。从学理层面上看，中国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避免政府权威在变革过程中过度流失，以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二是要保证这种权威真正能够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的“回归”。这在中国转型实践中构成了一个两难的症结。^②

学者孙立平认为，转型期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断裂”——中国

①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② 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社会的两极化趋势。这个断裂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其具体表现是：“社会框架脆弱，没有能力抵御社会震荡、处理和化解各种突发性的事件；社会认知短浅，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问题难以形成共识；作为社会运行主导者的政府的问题和危机酝酿之时往往麻木不仁，当问题显著化或危机来临之时，在传统思维方式惯性作用的支配下，其又会更多地强调问题和危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不适当地强化了问题和危机中的敌对因素，从而导致政府在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措施。此种过分紧张和防卫过当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危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且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时代的社会诉求共存于一时。^①

此外，中国社会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一种与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这种状况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

二 全球化引发的风险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以后，人类开始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所谓“全球化”，在赫尔德等人看来，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② 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只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就

①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2、115 页。

② [英] 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